

弗洛伊德案正式审理 美种族歧视痼疾难除

新华社华盛顿3月29日电(记者 邓仙来 徐剑梅)美国白人警察德雷克·肖万被控杀害非洲裔男子乔治·弗洛伊德一案29日在明尼苏达州明尼阿波利斯市开庭审理。

美国历史上鲜有警察因过度执法受到指控,因此对肖万定罪面临较大难度。分析人士认为,尽管弗洛伊德案在全美掀起抗议浪潮,但仍难以从根本上消除美国社会的种族歧视痼疾。

庭审首日

29日是弗洛伊德案庭审首日。庭审开始前,弗洛伊德的家人和律师以及美国民权运动领袖在法庭外举行新闻发布会,并跪地约9分钟以示抗议。

当天,主审法官彼得·卡希尔和由14人组成的陪审团分别听取了检方律师和被告律师的案情陈述,以及多名检方证人的证词。美国媒体预计,该案审理进程或持续一个月。

开庭后,检方律师杰里·布莱克韦尔首先作案情陈述。他向法庭播放了肖万去年5月25日在执法过程中持续跪压弗洛伊德颈部长达9分29秒的视频。布莱克韦尔说,在此过程中,弗洛伊德27次发出“我无法呼吸”的呻吟,而肖万始终没有移开膝盖,直至弗洛

伊德死亡。他认为,肖万在弗洛伊德已被制服的情况下仍对其使用“过度且不合理”的力量,因此弗洛伊德之死是一起谋杀。

被告方律师辩称,弗洛伊德之死并非因肖万长时间跪压导致,而与弗洛伊德过量服药及心脏病、高血压等基础性疾病有关。同时,由于肖万在体水上与弗洛伊德相比处于明显劣势,其跪压行为不能被视作过度执法。

庭审过程中,安排肖万出警的报警中心调度员称,肖万和其他三名警官抓捕弗洛伊德的执法录像让她感觉“事情不对劲”。案发时拍摄了7段现场视频的一名目击证人向法庭描述了案发时的情景。身为武术运动员的另一名目击证人认为,肖万的跪压动作导致弗洛伊德颈部供血受阻。

定罪不易

检方指控肖万二级谋杀、三级谋杀和二级过失杀人三项罪名,最长刑期分别为40年、25年和10年。肖万未对任何指控认罪。

分析人士认为,鉴于美国历史上鲜有警察被指控,被定罪者更少之又少,肖万被定罪的可能性不大。

去年接手该案的明尼苏达州总检

察长基思·埃利森曾警告称,给肖万定罪将十分困难。“不是因为我们怀疑自身资源或能力……而是历史的证明,定罪存在明显挑战。”

据俄亥俄州立鲍灵格林大学统计,2005年至2019年间,共有104名警察因执勤时开枪被逮捕并被控谋杀罪或过失杀人罪,其中仅有35人被判有罪。

印第安纳大学法学院教授珍尼娜·贝尔说,统计数据显示,陪审团成员更倾向于相信警察的证词,而非目击证人的证词。

贝尔认为,陪审团更有可能认为肖万的行为是合理使用武力,因为人们受种族偏见影响,通常将非洲裔美国人与暴力和犯罪联系在一起。

痼疾难除

弗洛伊德案发生后,全美各地爆发大规模反暴力执法、反种族歧视抗议示威,这场“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得到全球各地广泛声援。但分析人士指出,该案仍难以祛除美国社会长期存在的种族歧视痼疾。

首先,种族因素不会成为该案判决的决定性因素。美国乔治敦大学研究刑法和种族关系的教授保罗·巴特勒

指出,在美国公众意识里,弗洛伊德案与种族问题息息相关。但讽刺的是,种族问题不会成为审判依据,避开种族问题是控辩双方共同的策略。

其次,该案无法消除美国不同种族间的分歧。《今日美国报》和益普索集团去年6月的一项民调显示,60%的美国民众认为弗洛伊德死于谋杀。但本月的最新民调显示,这一比例已降至36%。目前,有64%的非洲裔受访者认为弗洛伊德死于谋杀,而持此观点的白人受访者仅占28%。多数白人倾向于认为肖万的行为是玩忽职守。

此外,非洲裔并非美国种族主义问题的唯一受害者,拉丁裔和亚裔等少数族裔也长期遭受种族歧视。特别是新冠疫情在美暴发以来,少数美国政客借疫情对亚裔进行污名化,导致针对亚裔的暴力仇恨犯罪激增。近来,“停止仇恨亚裔”已成为继“黑人的命也是命”之后新一轮反种族歧视运动的口号。

美国杜克大学亚洲与中东研究系教授刘康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指出,美国从未妥善解决种族问题。近几年美国政治的严重撕裂,以及应对南部边境移民问题的态度都与美国国内种族矛盾有关。而这一矛盾不可能在短期内解决。

(接上期)

突然间车窗外一片黄亮,我探头一看,熟透了的小麦,完美承继了黄土地的基因。河南这片温热的黄土地,产生出全国十分之一以上的粮食,四分之一以上的小麦,以沉甸甸的国家担当,为14亿人扛稳了粮食的安全重任。

麦田边黄白的土路上,邓大哥扛着把铁锨站在那,仅半年多的时间,他的头发又白了不少。大哥看到我时,眼睛一眯,又一亮,说:“真是你哩,快去家里吧。”

邓大哥的家在村西南,我们穿村而过时,见水泥路两旁,整齐排列着一座座砖瓦房,一家一院,偶见一两栋白墙红瓦的小楼,看上去像短衣衫的人群里走出个长袍先生。各家的院落有大有小,大门楼却一律又高又阔,估计能开进去一辆农用四轮车。

一棵上了年纪的大槐树下,几个妇女坐在砖块上说话,几个找不到砖块坐的,就顺手揪掉一只鞋,一屁股坐在鞋面上,亮白着一只脚在那里比划。我们快要走近时,女人们突然静音了,有的背过脸不看我们,有的仰着脸盯着我们看。没等邓大哥开口介绍,我就笑着说:“老姊妹们好啊!待这儿凉快着呢。”

女人们明显愣了一下,很快笑着说:“是哩!是哩!来

了呗?”

光着一只脚的女人麻利地站起来,捡起屁股下的鞋子,弯腰穿上鞋,而后说:“上俺家喝口茶吧?”

我拉着她的手,说:“不啦不啦,谢谢妹子啊,回头去你家喝茶。”

开车的朋友从驾驶室偏过脑袋,眼睛里满是惊叹。

邓大哥把铁锨从右肩换到左肩上,对我说:“城里坐办公室的人都大样,你跟人家不一样。在新疆拾棉花那会儿,大家伙儿都看出来了,你跟我肩膀头子一般高,眼睛鼻孔不朝上。看得起我们农民,不嫌农村人脏。”

我说:“哪里话呀大哥,我也是在农村长大的泥巴妞,刚出门没几天,总不能不认识家里人了吧。”

一直以来,“自然,真心,不造作,不矫情”是我采写拾棉工时的真实姿态。在北疆农六师四场八连的棉田里,初次找见我们周口拾棉工时,我浅薄地显现出自己的小优势,煞有介事地又是拍照,又是录音,使顶着骄阳劳作的他们相当反感。一个姐妹生气地把脑袋埋进棉花棵里,说:“别照我!”我暗自脸红了一阵子,把相机扔到田垄上,默不作声地帮她拾了一天棉花。晚上还死乞白赖地挤上她的床铺。一天天过去,使我自然地融入拾棉工的生活,活像找见了在别处

生活的家人。我帮50多位老乡拾过棉花,也一天天地把他们的日子拾到了。我拾到了他们的故事,他们的人生,他们的命运,他们深层的灵魂。也一天天地找见了自己,那个原本真实柔软的我。我告诫自己:“你真了,文字才能真,才能显见那些隐蔽的真心与真相。”

进了邓大哥的高门楼,见院子里停放一辆四轮车,车斗里放着镰刀、麻袋、绳索、簸箕、扫帚,看上去满满登登。大哥把扛着的铁锨放进车斗,说:“这些都是收麦子用的,明后天就开镰。”我熟识这些农具,有种久违的亲切。想起小时候曾亲自割过麦子,还亲自使用过它们,不禁泛起一丝苦甘。

那时候,割麦、打麦都是人工,麦忙时大人小孩都使上。工人放工,学生放假,就连不沾亲带故的城里干部,都脱下皮鞋,挽起裤腿,下到麦田里干活。那种火热的灵动,庄重的仪式感,凝滞在我童年的记忆中。

我问邓大哥:“现在收麦不是用收割机了吗?这些老物件用不着了吧。”

邓大哥说:“规整的大块地,机器收割起来方便些,沟沿、地边,边边角角的小块地,还得用镰刀一把把割下来。”

我问他今年种了多少麦子?他说,28亩。不光是他的

地,还有两个儿子的,就连邻居家撂荒不种的地,他也捡来种了。

我说:“没想到大哥你不光会拾棉花,还会拾地呢。”

他说:“刚才咱从村里过,你都看见了吧,一半的人家锁着门。人都进城了,剩下些走不掉的妇女老人守着村,老人干不动农活儿,田地就租给别人种了。前几年逢到麦季子,在外的人还回来收收麦、种种秋,你瞧瞧现在,没回来几个人。”

“你那两个儿子也不回来收麦吗?”

邓大哥学着大儿子的口气说:“爸,你叫我回去弄啥?一斤麦子才卖一块多钱,除去种子、农药、化肥、浇水、除草花的钱,能挣几个钱啊?你想想啊爸,我们口子加上我弟弟口子,四个人回去的路费得花几千块,请假回家工钱又扣几千块。这还不算,弄不好还得丢工作,我在外边磕头拜门的,好不容易找个稳当点儿的活儿,收了麦回去又不稳当了,弄不好还被人顶替了。爸,你算算这个账,我回家割麦划算吗?你别急,我在网上约了一家收割机,连夜割,说好了,到时候我用支付宝把收麦的钱转给他,你不用管了。”

(未完待续)

(此书由河南文艺出版社出版)

